

中国人民大学古代文学与文献学研究丛书

从文献到文本

先唐经典文本的抄撰与流变

孙少华 徐建委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古代文学与文献学研究丛书

逆文秋到文本

先唐经典文本的抄撰与流变

孙少华 徐建委 著

袁行霈题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文献到文本：先唐经典文本的抄撰与流变 / 孙少华，徐建委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10
(中国人民大学古代文学与文献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5325-8236-5

I. ①从… II. ①孙… ②徐…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唐代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30197 号

中国人民大学古代文学与文献学研究丛书

从文献到文本：先唐经典文本的抄撰与流变

孙少华 徐建委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 × 965 1/16 印张 17.5 插页 3 字数 260,000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100

ISBN 978-7-5325-8236-5

I · 3108 定价: 5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本成果受到中国人民大学
“统筹支持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经费的支持

序

刘跃进

在《文学遗产》编辑部积极推动下,文学所部分青年学人与国内一些重点大学青年才俊自发成立读书会,不定期地举办专题研讨会。周秦汉唐读书会就是其中一个比较活跃的读书会。通过读书会形式,深入探讨不同专题的研究方法、学术倾向以及存在的问题,具有“开风气”的学术意义。我们想依托《文学遗产》纸质本和网络版优势,组织学术活动,展示学术成果,营造学术氛围,聚集五湖四海的志同道合者,守望传统,回归经典。参加读书会的学人,研究课题各有不同,是“读书会”把大家聚在一起,“形散神不散”。学术研究要“形散”,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同时,又要努力维护一种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学术环境。这就是我们要追求的“神”。

周秦汉唐文学研究的“神”在哪里?就很值得讨论。众所周知,周秦汉唐是中华文化经典产生的最重要时期,也是中华古籍传播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钞本时代”。对于这一历史时期经典文本的研究,现在处于瓶颈状态,如何前行,面临困惑。可喜的是,很多优秀的青年学者立志在继承传统研究方法基础上,借鉴海内外学术研究的经验,扬长避短,力辟蹊径,从更高的层次上对这段文学进行深入的探索。我想,这种求真务实的学术品格,对于把握周秦汉唐文学研究之“神”,别具重要意义。周秦汉唐读书会第一期的主题是“钞本时代”的经典研读,论及钞本与定本的关系、文学史的写法问题、物质文化与精神文明的综合研究问题。其中一些重要观点,已经发表在《求是学刊》2014年第5期,我建议大家不妨找来一读,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孙少华、徐建委是周秦汉唐读书会的成员之一。他们积极参与

讨论,撰写文章,并在此基础上,博观约取,深思熟虑,合作完成这部名为《从文献到文本》的专著,其副标题是《先唐经典文本的抄撰与流变》。顾名思义,作者把唐代以前的文本文献作为考察对象,涉及先唐经典、文本文献以及钞本传承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如何界定、评价先唐经典,这是见仁见智的老话题,向无定论。中国学问源于《诗》、《书》、《礼》、《乐》、《易》、《春秋》等所谓“六经”,汉代称为“六艺”。《乐经》不传,古文经学家以为《乐经》实有,因秦火而亡,今文经学家认为没有《乐经》,乐包括在《诗》和《礼》之中,只有五经。东汉时,五经以外,增加《孝经》和《论语》,合为七经。隋炀帝以“明经”科取士,唐承隋制,规定《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连同《周易》《尚书》《诗经》,称为“九经”。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将十二部经书刻在石上,在九经基础上增加《论语》、《孝经》、《尔雅》三书,史称《开成石经》。宋代为抬高《孟子》地位,朱熹作《孟子集注》,列入经书行列,于是儒家经典成为《十三经》。这是儒家基本经典,也是中国文化的最基本典籍。

当然,也有以五经为基础而又有扩展者。如陈代末年至初唐时期的陆德明著《经典释文》,收录汉魏六朝二百余家对《周易》等十四部经典的释词注音等资料,所论“经典”,还包括《尔雅》、《老子》和《庄子》等。清代著名学者段玉裁《十经斋记》(《经韵楼集》卷九)又益之以《大戴礼记》、《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说文解字》、《九章算经》、《周髀算经》等,以为《二十一经》。无论如何划分,都以《五经》为基始。

现代学者的划分又有不同。黄侃认为真正可以称为经典的只有八部,即《毛诗》、《周礼》、《左传》、《史记》、《汉书》、《文选》、《说文解字》、《尔雅》。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在杭州大学读书时,姜亮夫先生指导我们要终身研读十二部经典,即:《诗经》、《尚书》、《周礼》、《礼记》、《周易》、《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论语》、《老子》、《庄子》、《楚辞》。这个书目以《五经》为核心,辅之以“三礼”“三传”。“三礼”中比较难读的《仪礼》没有列入。从中国文学史的角度看,我认为还应当加上《文选》。这是文化史上的《十三经》。从《从文献到文本——先唐经典文本的抄撰与流变》的论述范围看,作者心目中的经典,含义更加广泛,包括诸子一类的典籍,如《淮南子》、《吕氏春秋》

等,属于广义的经典范畴。

作者讨论的另外一个话题,是先唐的文本文献。这与今天所说的文献,不仅包括书面材料,还包括音频、视频等技术手段记录人类知识的一切载体多有不同,而与《论语》所说“文献不足征也”的“文献”含义相近,是指各类图书、典章所记录的各类知识。元代马端临编纂《文献通考》即取意于此,强调的是语言文字记载的文本文献。这类文献数量很多,内容很杂,后来便衍生出一门学问,叫文献学。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认为:“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他又说:“我们所提倡的国学,什有九属于这个范围。”这便与经典发生关系。我的理解,孙少华、徐建委所说的先唐文本文献,大约近于梁启超划定的范围,是狭义的文献,而且是先唐的狭义文献,也就是早期钞本时代的文本文献。

近年来,“钞本文献”、“刻本典籍”、“文本演变”等问题备受海内外古典学界的关注。按照后现代理论,钞本时代的经典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不断叠加的情况。流传至今的先唐文本文献可以有单一的资料来源,也可以具有多重早期资料来源,出现异文,很不稳定。今天所看到的众多版本,很难说哪些是定本,哪些内容是后人叠加进来的。不同文本的不同性质本身已经成为文学史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照此推论,先唐文本文献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阅读这些文献,很可能就会出现言人人殊的情况。据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先唐经典的稳定性不复存在。

但是,问题远不是预设的那样简单。

如果从殷商文字开始算起,传统文献流传至今已经三千多年。汉代以来,佞古思潮长期居于主导地位,认为现存早期文献都是老祖宗说的,老祖宗写的,老祖宗传下来的。《庄子·天运篇》提到的“六经”就是今天看到的《五经》。宋元以后,怀疑思潮泛起,直至清初,很多资料得到系统的整理。以阎若璩为代表的一批重要学者发现,像《尚书》这样的早期文献,其中有很多记载相互矛盾,有必要进行清理,甚至提出质疑。19世纪末,疑古思潮甚嚣尘上,与此前的疑古之风遥相呼应。俄国汉学家王西里(V. P. Vasiliev, 1818—1900)《中国文学史纲要》(1880年出版,圣彼得堡国立孔子学院2013年中俄文对照出版。全书330页)认为,除《诗经》、《春秋》外,现存先秦典籍多数

是汉代产物,甚至更晚。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提出十二种辨伪的方法,也将很多先秦以来流传的典籍列入伪托之作。类似这样的观点,左右学术界将近一个世纪。

最近三十多年,地不藏宝。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材料证明,中国早期文本文献的传承相当复杂,梁启超提出的辨伪方法,大多数站不住脚。而且,更重要的是,现在所有出土文献,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学术史的面貌。即便是甲骨文,也只是证明司马迁所见史料比较确切。这充分说明,中国早期文献确有其稳定性品质。

当然,这只是中国早期文献的一种形态,其不确定性、可质疑的因素依然大量存在。譬如司马迁《史记》的记载就常常自相矛盾,有些场面的描述更像小说,甚至可以这样说,早期的历史文献,很多像小说。这也容易理解。中国古代早期文献,始于口头传播,经过漫长的流传,最后被写定。在流传过程中,口传文献信息不断累积,不断演变,最终形成文本文献。《汉书·哀帝纪》、《天文志》、《五行志》都曾记载汉代流传的“讹言行诏筹”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五行志》说:“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惊走,持稿或椶一枚,传相付与,曰行诏筹。道中相过逢多至千数,或被发徒跣,或夜折关,或逾墙入,或乘车骑奔驰,以置驿传行,经历郡国二十六,至京师。”其载体、文字、解读、影响不断变化,说明一个文本文献,从口头传播,到最后定型,在这个过程中,制造者、接受者、传播者、阐释者各不相同,所产生的文本内容也就颇多差异。

出现这种情形,至少有主客观两重因素。从客观上说,早期的历史,口耳相传。历史的主干为经,比较粗略;后人的阐释为传,注重细节。经与传,逐渐合流,便形成历史。司马迁就是根据这些经与传,勾画出中国三千年发展的历史。从主观上说,任何历史都是人来书写的。有了人,便有不同的思想。对于同一历史材料,不同的人,便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处理。平民历史学家写历史是一种写法,官方历史学家又是另外一种写法。不论是谁,站在不同的立场,对于史料就有不同的取舍,甚至是有意的遮蔽。这种现象,无处不在。文化不高的刘邦、相貌一般的朱元璋,都被历史学家描绘成“隆准而龙颜”、“姿貌雄杰,奇骨贯顶”。至于他们的劣迹,则略而不记。秦汉对于历

史著述、诸子百家的控制非常严密,像《史记》这样还算比较公允的史书,东汉初年的汉明帝诏问班固,批评司马迁“微文刺讥”,东汉末年的王允也视《史记》为“谤书”,禁止其流传。蔡邕在江南看到王充《论衡》记载很多六国以来的历史故事,叹为异书。站在今天的立场推想,从战国末年列国的分分合合,到楚汉八年的血腥纷争,这里该有多少动天地泣鬼神的历史故事!可惜,只有一部被刘邦认可的陆贾的《楚汉春秋》残存于世,而精华部分已被《史记》收录,其他不计其数的历史文献已经烟消云散,以致后世没有产生一部类似于《三国演义》那样的历史小说,来描绘楚汉纷争,这真是一段历史的遗憾。显然,这是统治集团有意控制的结果。魏晋以后,当权者对于民间的掌控已力不从心,所以才会有三国故事逐渐流传开来,箭垛式的人物越来越丰满,多以三国故事为背景的讲唱文学逐渐成熟,最终酝酿出《三国演义》这样的历史小说登上文坛,历史与小说从此分道扬镳。历史似乎从此脱离小说,俨然以公正、真实相标榜,但在实际的历史叙述中,如前所述,由于立场的不同,对于材料的取舍便大不同,结论可能大相径庭。甚至在同一叙述者的著作中,也会常常有前后矛盾的记载。历史著述中的这些有意无意的错误,可以说随处可见。无意的错误可以理解,由于闻见有限,根据一些主观臆测充实历史文本,可能与史实相违背。而有意的错误更是不在少数。鲁迅在《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中说:“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着粪: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清代顾千里就主张不校之校,认为中国的典籍,毁就毁在历次的校勘整理上,校一次错一次,逐渐失却原貌。

由此看来,中国早期文献的抄撰与流传,非常复杂。其稳定性与可信度的矛盾无处不在。余嘉锡《古书通例》对此有客观的分析,要言不烦,很有说服力。他告诉我们,对于历史的理解,不能根据局部细节否定整体,也不能相信整体而忽视细节问题,凡事都要具体分析。这应当成为我们理性地对待中国早期文献所应持守的基本原则。

孙少华、徐建委所著《从文献到文本——先唐经典文本的抄撰与流变》努力恪守这一原则。全书紧紧围绕先唐文献的歧异与文本形

成等核心问题,从先唐经典与文本文献入手,或宏观考察,或微观分析,提出了很多值得思考的理论问题。

首先,作者充分注意到先唐经典与文本文献的“历史性”与“时代性”问题。作者指出,阅读先唐文献,必须深入考察其产生的文化、历史、思想渊源,同时又要注意其所处时代的学术、社会、政治需要,避免将文本文献研究简单化与程式化,只是把它作为一个超越时空的文本而忽略其演变的细节。作者认真比对了《淮南子·主术》与《吕氏春秋》两书所引的相同文献,认为编纂者的身份、地位及其所处的地域、时代,以及编纂古书的目的、文本性质等不同,决定了文本文献中的文字表述、文本风格的差异。汉代人的“阅读习惯”、“阅读思维”使得他们在整理先秦文献的时候,既有对先秦文献的较多改变,也有可能完整保留,一定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其次,作者通过大量的实证分析,指出先唐经典与文本文献流传过程的复杂性与多系统性。文本文献是多层次、多系统的工程,其经典化也有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文选》所收左思《蜀都赋》,李善注引扬雄《蜀都赋》加以充实印证,读者可以接触到正文与注文两种文本,突破了单一选本的阅读限制,为读者提供了一个选本、注文以及二者重新组合而成的新的文本文献,拓展了读者的思考空间,从而有可能改变读者最初局限于选本正文而产生的误读,起到“纠偏”的作用。其结果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选本的原貌与编者的最初设想。这就是早期文本文献选本与注本的特殊作用。这个问题很有趣,值得继续探讨。

第三,为了印证上述两点认识,作者广泛考察了秦汉以来流传的“公共素材”,用以说明这些材料是如何改变历史的叙述。作者选择了两个重要节点展开自己的论述。第一个节点是两汉之际。西汉后期的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先秦典籍,编撰《别录》、《七略》,东汉初年的班固在刘向、刘歆父子成果基础上编修而成《汉书·艺文志》,它在客观上将先秦学术文化框架定于一尊,后世很难超越。这是大一统的中华文化的第一次系统整理的结果。第二个节点是唐宋之际。我在第一次读书会上作了《钞本时代的经典研究问题》的发言,指出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中华文化史上,唐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中国早期经典文献,大多定型于这个时期。学术界普遍认为,唐代咸

通九年(868)印制的《金刚经》，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事件。此前，学术界一直在努力推进儒家经典化进程，包括编纂“五经正义”、校刻《开成石经》，但是传播终究有限。随着宋代刻书事业的发达，文化经典走进千家万户，经典化工作也相应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本书作者以国家图书馆藏宋刊《毛诗诂训传》为底本，仔细勘对《毛诗正义》注疏中的五百多条异文，仔细考察了宋人是如何将这些异文整齐划一，最终完成经典化的定型工作。不仅如此，本书作者还以《晋书》为例，重点讨论这部唐代文本的独特风格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作用于历代读者的阅读想象之中，形成后来关于魏晋时代的“整体历史形象”。这些，都是叫人感兴趣的话题，很有可能改变我们以往阅读固化下来的观念，甚至改变文学史叙事的僵化格局。

《从文献到文本——先唐经典文本的抄撰与流变》书成，作者知道我对这些问题也有思考，便来信索序。我也想借此机会与作者、读者交流读书心得，便不揣谫陋，冒然应承下来，拉拉杂杂，可能言不及义，权作抛砖引玉吧。

是为序。

前 言

中国传统的文献学乃是材料之学,由此,它本质上一定是“为他”的学问。即便版本、目录、校勘之学本身充满了魅力和趣味,且均自成体系,但它们总是要受到某种学术意图的规范。布局、堆积、处理材料,是要为具有指向性的意图服务的,它们自身不是一座城市、一片区域,而是对构成这片区域、这座城市的所有存在物的检验和分析,最终是要规划出这片区域的“导航”。因此,文献学之于古典文学的意义,不可谓不大,只因有了它的存在,古典文学的研究才不至于成为无根之谈,然而它终究是文学研究的附庸,不具备主体性。

文学文献研究是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研究的基础,因此它的研究范围受到了文学史、文学批评研究目的之约束,其研究对象由文学研究的对象所决定。它存在的意义就是为文学研究的各层面做好材料方面的准备。比如,版本研究,文字的正讹、编纂的结构、版本的源流,解决的是作品文本的可靠性问题,至于各传本、各版本自身所具备的研究可能,则不在文学文献学研究的既定目标之列。特别是具备了“过程性”特点的先唐文献,不同文本含摄有丰富的研究可能,若以刻本范式待之,透过文本差异而照射出的学术、思想、文化的微光,便倏忽而散了。那种以恢复某一文本原始样貌为追求的企图,置之先唐,就是宋人资章甫而适越,无所用之。因此,先唐文献的研究尤其需要摆脱文学研究的目的导向,确立其研究的主体性。

同时,20世纪以来主导文学文献研究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本身就是一种外来的研究方式。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是20世纪中国的大学制度建立与完善的产物,实乃西学东渐的结果。文学一词,本就出于日译 literature,与《论语》、《史记》等古典文本中的“文学”差异颇大。而其作为一门学科,出现于1902年8月张百熙主持编定的《钦定

大学堂章程》。1904年1月,张之洞主持编定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延续之。林传甲《中国文学史》(1904)即依据《奏定大学堂章程》而撰写。因张之洞《章程》中的“文学”并非 literature,而是“文章学”之意,故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本质上是“中国文章学史”,而非 literature 的历史。同时期黄人、辜警凡之作,秉持的也是文章学的概念。稍早的外国人所作的中国文学史反而采用 literature 之意涵,如俄国人瓦西里耶夫(В. п. Васильев)《中国文学简史纲要》(1880)、日本人古城贞吉《支那文学史》(1897)、英国人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中国文学史》(1897)、日本人笹川种郎《支那历朝文学史》(1898)等,均是如此。

此后,中国文学史的“文学”采用何种意涵,则经过了二十年左右的摇摆,最终不出意外地选择了 literature。这一转变大概发生在1920年前后。新式大学制度在此前基本确立,其学科建设必然要选择西方的体系。朱希祖1920年于其《中国文学史要略》叙言称此书乃其1916年为北京大学所编讲义,彼时所讲乃“广义之文学”,而“今则主张狭义之文学矣”,并谓文学当与史学、哲学并列独立为一专门领域。可见自1916年至1920年,文、史、哲的分科观念已被广为接受,文学独立或曰纯文学(即 literature)的意识已开始左右“文学史”作者的视野。亦在1920年之后,中国文学史的写作迎来第一个高峰,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各校要为中文系准备教材。至1930年前后,中国文学史的规模业已基本形成,戴燕在《中国文学史学史》中称为“中国文学史现代范型的确立”。即文学史的内在结构、叙事样式等基本定型,直至今天亦无根本性变革。

特别重要的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大学制度日渐规范,使得文学史作为一门大学课程被固定下来,成为中国大学中文系主要的基础课程之一。新中国以后,大学中文系的课程设置虽有革新,但中国文学史作为基础课程还是被保留了下来。

虽然大学教育中的基础课程与学术研究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但是这些课程却对古代文学的专业学术有着某种先导性或基础性作用,原因在于:绝大多数的专业学者均出自中文系,是接受中国文学史教育而成长起来的。我们知道,20世纪40年代以后出生的学者,已经很少有私塾经历,传统的经学、史学和小学等古典知识已非

其知识结构的主体,多数人是在现代的教育体系中接受教育。这些前辈们的古典知识结构主要依赖大学教育而形成。而作为中文系骨干课程的中国文学史,因此扮演了极为基础的角色。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史这门课程,建构了绝大多数中文系学生理解古代文学的先天结构,甚至专业学术研究中的叙事方式也受到了中国文学史的影响。可以说,在20世纪30年代所确立的中国文学史范型,事实上在影响着今天的研究,甚至是很多研究的背景结构。

从这个角度而言,古典文学研究的起点,或者说其基础问题方式是有先天局限的。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理路或思考倾向,直接限制了其向深广的学术境界拓展:

其一,“文学性”标准。如前所述,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核心规范乃由 literature 的诸义素铸成。因此,古代哪些文本符合 literature 的标准,即具有“文学性”,便成了古典文学研究中的首要鉴别原则和原初思考。由此而来的发现古代文本中的“文学”,重建其历史传统,就成了研究中的潜在取向。另外,研究者是否准确地发现了“文学”及其历史,也成了古典文学研究自我评价的核心价值之一。如以“文学性”为标准“发现”戏曲与小说,并使之成为明清文学的主角,就是一种全新的文学传统的“重建”。故“文学性”在研究中实质成为一种选择标准。

以“文学性”为标准作为研究的起点,必然首先要从古代文本与历史中,“识别”并“剥离”出“文学作品”及其作者,然后重构这些被剥离出的部分,形成连续性的文学问题和文学史。此种问题方式具有“选择性”特点,使得古典文学研究本身就属于先有问题,然后求解于材料的路向,更像是一种“预设研究”。这种研究范式的症结在于:在连续性或整体性的材料当中,只选择那些与问题有关的文献。这当然无可厚非。但是,我们必须留心:问题的设问或选择可能存在局限。这种潜在的局限,在连续性材料的分析中很可能暴露,但在碎片化的材料支撑下,反而被很好地遮蔽起来。如仅以诗歌传统讨论唐代文学的过程,会有比较清晰的文学发展路径。但是若将诏令、奏议、经史注疏、史传、碑志等其他文本类型加入进来,唐代文学是否还是诗歌传统所展现的那个“过程”?

其二,民间取向。20世纪初年,新学学者普遍推重民间或通俗文

化。如胡适《白话中国文学史》曰：“当方苞、姚鼐正在努力做韩愈、欧阳修的‘肖子’的时候，有个吴敬梓也正在做《儒林外史》，有个曹雪芹也正在做《红楼梦》。那个雍正、乾隆时代的代表文学，究竟是《望溪文集》与《惜抱轩文集》呢？还是《儒林外史》与《红楼梦》呢？再回头一两百年，当明朝李梦阳、何景明极力模仿秦汉，唐顺之、归有光极力恢复唐宋的时候，《水浒传》也出来了，《金瓶梅》也出来了。你想，还是拿那假古董的古文来代表时代呢？还是拿《水浒传》与《金瓶梅》来代表时代呢？——这样倒数上去，明朝的传奇，元朝的杂剧与小曲，宋朝的词，都是如此。”此种重视通俗或民间文学取向，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文学史和文学研究。新中国以后，由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来的民众路线，更加强了此种思考倾向。故多数文学史的研究与叙事，往往或深或浅地隐藏着“民间取向”。这种问题方式之下，《国风》基本被“民歌化”，而乐府诗、戏曲、小说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此类研究除了是对传统反叛的必然结果外，本质上也是一种“选择性”研究。

其三，选本视野。以“文学性”为标准重构中国的“文学史”，也有历代的诗文评、诗文选本作为传统资源。诗文评、诗文选本是清代以来普通读书人了解中国古诗文传统的主要媒介。大型总集及文人别集因其体量与良莠并存的特点，并非是普通知识层面获取诗文作品的主要途径。如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每章后列有参考文献，让我们有机会发现古代文学研究的初建期的文献基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唐代文学部分所列的参阅书目，如《杜甫》那一章的参考书目是：1.《全唐诗》；2.《全唐诗话》；3.《唐诗纪事》；4.《唐才子传》；5.《唐百名家诗》；6.《五十唐人小集》。这几部书再加上《唐音癸签》几乎是郑振铎所列唐诗的主要参考文献。除了《全唐诗》之外，均属“选择性”文本，而《全唐诗》虽然是必备文献，但不可能是其文学史写作的主要参阅本，这也是自然的事情。故而，《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唐诗部分的基础是《唐百名家诗》和《全唐诗话》这样的诗选本和诗话。那么此文学史名著所展现的唐诗历史，恐怕就是建基于选本和诗话的“阅读印象”之上。诗文评、诗文选本一般是选择和评价的路数，与以“文学性”为标准重建诗文传统的方式若合符契，故其“品鉴”思维也自然成为古代文学的内在问题方式之一。

当然,一百年来,古代文学学科已成高度成熟,其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贡献令人瞩目。不过,近年来学者们也普遍意识到了某种路尽途穷的危机。此门学问目前渐现狭浅之态,问题方式显得简单,很多研究论著,一看题目,便可猜出研究的方法、层次,甚至结论。若排除史学、文献学研究的相关内容,仅就文学研究的部分而言,很多研究论著在学理层面、问题层面甚少贡献。或者说,一百年来的古代文学研究真正的贡献还是在史学、文献学方面,“文学”方面相比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郑振铎、林庚、刘大杰的文学史,实质性的拓展是很不够的。同时,学者间的共同话题也越来越少。学者间缺少共同话题,意味着这门学问连续性的研究话题不多,研究亦缺少可持续性,也说明进入问题本身的深度开掘非常罕见。故其学术厚度、学理深度方面是有先天缺陷的。

因为问题方式的“选择性”特点,古代文学研究与本土文化的联系亦颇奈寻味。虽然它研究的对象是李白、杜甫,但却是从本土文化中挑拣、剥离出来的,用“文学史”方式重构后的李、杜。文学史的主流问题方式主要围绕“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四个相互关联的要素展开,这样的问题方式重构出来的文学史和文学问题,极易进入简单化的“关系研究”。“关系研究”本身就属于先有问题,然后求解于材料的路向,更像是一种“预设研究”,如“作品与其时代的关系”这样的话题,就是在“时代精神”这样的问题预设下展开的。那么,依据“阅读印象”,抽取文献片段,重构“时代精神”是在所难免的工作。同理,“作家与作品的关系”、“作品与读者的关系”、“作品与世界的关系”、“读者与世界的关系”、“作家与读者的关系”等,都是“预设问题的研究”,而非“发现问题的研究”。因此,20世纪以来的主流古代文学研究,本质上是对本土文化的“选择性解释”。

因此,从根本意义上说,古代文学更像是一门西化的学问。它是用西学的眼,去“发现”古代文本中的文学传统,重述属于中国的文学故事。百年的研究,多为评判和诠释,缺少一种关于研究本身和经典文本的批判性思考。时至今日,确需一种复归于文本的实践,来根除古典文学研究的先天弊病。

当我们以传统的文献学手段备齐了材料,但不急于判断正讹,而是深入文本之间的差异,探索单个文本内部的机理,就会发现一些真

伪判断之外的问题。比如文本的编纂过程与内部结构的关系、同一文本的渐次新变、不同文本之间的互动等。这些问题不是为准确理解文本的内容服务的,而是关注于文本本身,乃是从材料的清理中,发现古人的意图。前辈学者在此方面已经有很多的研究,却与文献学相混,而没有被意识到它与传统文献学之间的差异。虽然研究类型的命名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区别文献与文本研究的关系,也显得小题大做。然而,是否秉持研究方式方面的自觉,亦非毫无意义,因为只有具备了范式的自觉,才会有新的研究形态发生的可能,才会使得我们在面对如此丰富的古代文献之时,有一门具备主体性的学问。

古典文本是一个被不断建构的过程,从其写成,到其被经典化,乃至后来的各种重译,都与下述因素相关:历史情境和学术传统,人们的写作方式与阅读习惯,文本的物质形态与流传方式,人际交往的模式与规模,共识的形成与传布等。这些因素不仅仅是文献研究或接受研究的问题了,它们构成了连续性问题,关乎对文明的整体性思考。故返归文本的思路,并不局限于文本本身,它是对经典塑成的追溯,是对经典重译的解构,更是对中国文学研究新范式的探索和尝试。

这就是本书标题“从文献到文本”的拙思所在。